

俄罗斯引进中国文化的四次热潮

李 明 滨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俄国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末三百年间引进中国文化的四次热潮。随着中俄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从设置、仿造中国景物和中国建筑,收藏和研究中国文物,译介和研究中国文化典籍,到大规模、有系统地翻译中国古代直至现当代的文学著作,使得中国文化和儒学思想对近现代俄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中俄之间早就有文化来往,如果从我国清代康熙皇帝和俄国彼得大帝当政年间,即17世纪末开始有定期往来,形成交往制度算起,那么中国文化传入俄罗斯也有三百年了。其间曾造成俄罗斯引进中国文化的四次热潮。

第一次热潮:18世纪

彼得大帝在18世纪初实行改革,厉行欧化政策,把俄国人的目光引向西欧。那时的西欧早已同中国建立海上交通,尽量传播有关中国的信息,引进中国的文化与文物,并在17、18世纪逐渐形成“中国热”。俄国模仿西欧,大致与西欧同步掀起了“中国热”,主要表现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宫廷和上流社会热衷于中国文物、建筑艺术和工艺品,民间注意搜集丝绸织品、饰物、瓷器、漆器,知识界则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一时间成了文明的时尚。18世纪一百多年间当政的三位沙皇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热”。彼得大帝(18世纪初叶在位)建立“珍品博物馆”,展藏世界珍奇古玩,并亲自搜集中国文物藏品,其女儿伊丽莎白女皇于18世纪中叶在位(1741—1761)期间,一辆辆大车装满从中国采购的屏风、漆雕桌子、餐具、大红灯笼,直至丝绸、木器等,穿过遥远的西伯利亚,连绵不断驶向彼得堡,以致人们用“伊丽莎白的中国格调”来形容当年的盛况。第三位是叶卡捷林娜二世女皇(18世纪下半叶在位)。她的“中国热”劲头大大超过两位前任。修建和扩充皇家园林里的中国式建筑,使之形成规模,写诗宣扬中国皇帝,提倡传播中国古代文明。

在叶卡捷林娜二世当政时,俄国报刊发表宣扬中国理想皇帝的文章,如翻译宋朝程颐《为太中上皇帝应诏书》(俄文标题译为:《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和清朝《雍正帝传子遗诏》。女皇受这种气氛的影响,也宣告要实行“开明专制”。她同其“法国老师”启蒙主义者伏尔泰等人通信,时常谈论中国“理想的吏治”,称颂中国皇帝为“我可爱的彬彬有礼的小眼睛邻居”。还写出滑稽可笑的法文小诗:“中国皇帝/饮酒微酣/作起可笑的鬼脸……”。

在俄国首次引进中国文化的热潮中,成果最明显,而且足以传之久远的,是散布在彼得大帝、伊丽莎白女皇和叶卡捷林娜二世女皇各自的皇宫、离宫或行宫诸处园林里的中国景物,即

彼得堡皇家园林中的诸多中国建筑。

圣彼得堡以风景优美著称，同时也是一座闻名遐迩的博物城。它自1703年建市以来，就注意广采各国古今建筑艺术，搜罗世界珍奇文物，建设东西方风格的景致和种类繁多的博物馆。人在彼得堡街上走，随处都可以遇到美丽的去处，几乎是五步一景、十步一馆，盛景之多，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这个美丽的国际都会中，其中国景物，著名的有：

1. 涅瓦河畔、彼得大帝屋前的中国石狮

石狮之多，在中国已不足为奇。每一个大而重要的机关、单位，甚至商场、公司，门前都要安放一对石狮，很是风光。但在彼得堡街头唯一的一对中国石狮，却构成了出名而重要的风景点。

在市中心彼得大帝住过的小木屋前，面向涅瓦河的斜坡上，矗立着一对蹲式中国石狮。狮身连台座高约3米，台座之下的石头大台基也有3米高。这样一对大石狮雄踞在涅瓦河岸上，相当雄伟。两只石狮相隔约20米，中间是十几级宽大的石阶，由河岸缓缓降至河边。1703年建市时只有小木屋，后来续建了石阶，意在使小木屋（通过涅瓦河）与外界相连，显得通达，以表现彼得的开拓精神。但光有石阶，总显得有所欠缺，所以在二百年后才增设了石狮，景致就活起来了。那是因为吸取了中国的传统观念：在王宫或府邸，以及寝陵的门口设置石狮，寓意在护卫和镇守，有保护神之意。如今人们乘船从涅瓦河上过来，远远地就看到这对石狮在为彼得大帝守门，看望着他走向海洋的通道。

查阅石狮的来历，它可是地道的中国产品。其台座两侧刻有一行斗大的汉字：“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十月毅旦”，后侧刻有产地“吉林”。台基则用俄文刻有如下字样：“狮子”“于1907年自满洲的吉林市运抵圣彼得堡”，“步兵上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格罗杰科夫之贡品”。这同美术学院大楼前面的那对古埃及出土的人面狮身石雕（系一位俄国驻外使节购得运去的）、海军部大楼前的一对俄罗斯大石狮三者相映成趣。它们的来源、国别不同，形态姿势各异。一个是蹲式，另一个呈俯卧式，第三个为行走式，但一起展列在市中心的滨河岸上，组成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供人们游览参观。这使人既感到这座城市的博物馆意识相当浓厚，搜求展品务求种类齐全，又看到中国的文化产品已和彼得堡的文化环境融为一体。

2. 彼得宫的中国花园和中国室

城郊的沙皇离宫——彼得（大帝）宫占地约一千公顷，始建于18世纪初叶。背依丘陵，面向芬兰湾，华丽的宫殿，优雅的花园，依山势建成的阶梯喷泉，无数镀金的希腊神话人物雕像，一切显得美丽壮观。这里有许多东方格调的园林。坡下花园中就有生动传神的巨龙喷泉——一条彩塑镀金的巨龙张牙舞爪，状欲腾飞，强劲的泉水从龙口喷射出来，极为壮观。

离此地不远就是一座“中国花园”，它建成于1766年。内有贝壳形和花瓶形两座喷泉。依照中国园林的风格，在有限的空间内集中了许多景致：假山怪石、曲径通幽、小桥流水、花圃树丛、大理石雕像。不过已略带欧化的风格，在东方格调的园林里居然塑造了两尊男女爱神。

彼得宫内的“中国室”设于中心宫殿里，分为东西两间。均建于1766—1769年。在中国室四周墙壁挂有中国画屏。在黑色漆底上有烫金烫银的画幅，山水人物齐备。室内陈列瓷瓶木器、雕花桌椅、各式古玩，均来自中国，为中国所制。地板用名贵木料拼花铺成。在西中国室，同样是拼花木地板，均用檀香木、乌木、柠檬木等来自中国或东南亚的名贵木料。天花板饰有彩绘，悬挂中国大吊灯。室内饰物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南墙一幅大型漆底木雕画：《满洲旗人村营》七个汉字清晰可见，画中有楼宇、旗帜，上操的士兵行列和威武的骑马军官。那件大型彩绘的磁质取暖火炉，也使人感受到浓厚的中国氛围。

3. 喷泉楼里的中国客厅和花园的中国亭

彼得堡市中心区，有彼得大帝及其宠臣们各自建造的许多花园式洋楼，里面都少不了中国

景物。彼得大帝有夏宫、夏花园，同夏花园毗连的是谢列梅捷夫喷泉楼，楼内设有“中国客厅”，完全按中国格调装饰，一应摆设均为中国器物，它是举行假面舞会和招待会的场所，伊丽莎白女皇就经常出入其间。花园里的水池边建有一座中国亭子。

这类花园洋楼如今多数辟为博物馆，仍保留历史的风貌。象离喷泉楼不远的舒瓦洛夫宫有“蓝客厅”，摆满 18 世纪的大小中国彩色花瓶，用中国丝绣、绒绣覆盖的家具，成套的石雕，包括玉石、黄晶、水晶、紫晶。“园客厅”里摆放描金的中国雕椅、中国餐具，书房也是中国家具和小摆设。

1735 年还曾以从中国移植来的植物为主开辟了俄国第一个国家植物园。

4. 皇村里的中国亭和中国桥

从 1937 年起改名为普希金市的彼得堡卫星城，是当年的皇村，系因普希金曾在皇村上学而改的名。皇村始建于 18 世纪初，是一处宏大的宫殿建筑和公园。后来由彼得大帝“馈赠”给妻子，曾充当几代沙皇的行宫。叶卡捷林娜二世女皇即位后，于 1770 年实行改建，扩成叶卡捷林娜宫，又增辟了叶卡捷林娜公园。女皇同时为其孙子，即未来的亚历山大皇帝在相邻处造了一座占地 200 公顷的亚历山大公园。这三处都设有中国景致，而且至今仍然保持景点。

女皇宫内二层楼上辟有“中国蓝色客厅”，在油漆的蓝色墙上镶有中国画和涂金木雕，厅内陈列均为中国器物、古董。宫中有一只清代皇帝赠送沙皇的北京红漆大花瓶。

女皇的公园古木参天，浓荫蔽日，奇花异木，茅舍石雕，人工的造设和天然的风光融为一体，在清水涟漪的湖畔，建有一座很大的“中国亭”。系两层的建筑，一层为园形宫式，两厢各一侧室，第二层为四周立有 12 根园柱的凉亭，屋顶是凉亭式塔顶，上面竖立一面黄龙旗。中国亭色彩鲜艳，与湖泊组成一大景观。

亚历山大公园内的“中国桥”建于 1785 年，位于公园深处的一条连通各湖泊的小河上，为石砌的拱形桥，桥面宽阔，可容几个人并行，至今仍为旅游景点。园内本来还有规模很大的“中国城”，可惜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目前仅遗断垣残墙。

关于中国景物，还有一处在彼得堡远郊的奥兰宁包姆（今罗蒙诺索夫城）内的“中国宫”，建于 1762—1768 年。

第二次热潮：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

如果说上一次热潮的显著成果是建立中国景物，那么这一次热潮的重要收获则是蒐藏中国文物和译介中国文化典籍。

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以及《道德经》等诸子百家以摘选、语录的形式出现俄译本，同时把《三字经》、《千字文》列为汉语、汉学院校的教材。

至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则大量收集中国民间年画、挖掘敦煌文献和西夏文物，分期分批运往彼得堡，藏入各类博物馆。

俄国收藏文化展品之富当属国家博物馆“埃尔米塔日”，俗称冬宫博物馆，系利用旧皇宫冬宫建成的。宫内展品逾 270 万件，在欧洲可与法国卢浮宫相媲美。每年接纳观众 3500 万人以上。

在彼得堡的这座博物馆内分 6 个部，其中的东方国家文化艺术部设有“中国文化艺术厅”，占 13 个陈列室，收藏大量中国艺术品，从元代至清末的各种瓷器，从明代至清末民初的各种漆器、珐琅器皿、景泰蓝，20 世纪的彩色泥塑民间玩具、民间剪纸、民间年画，各个朝代的石刻、木雕艺术品，红木家具和各式各样的文房四宝。很有意思的是御药房里那只中国大陶罐，据说明，那是彼得大帝订购去用的。

有一幅 17 世纪宫廷用漆雕大屏风，计有 6 折 12 扇，展开来总长 720 厘米，高为 280 厘米，系双面雕，一面为花鸟，另一面是宫廷人物生活场景。据说是中国专为冬宫制作的。

宫中所藏中国丝织品和丝绣，也不在少数，还有珍贵的“刻丝”，从帕米尔考古发掘出来的公元前 5 世纪至 3 世纪的丝织物。

古钱币部有中国古钱币约三万件，大量的春秋战国以来的铜钱、银元宝和金元宝。纸币有 35000 张，其中 13 张元代的纸币极为珍贵。

本世纪初，英、法、日、俄等列强争相盗掠我敦煌文献和西夏文物。帝俄多次派出考察队到我国西北边陲进行考古挖掘。鄂登堡等人的考察队几次到达敦煌，运走大批文物珍藏，现存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等各博物馆。有敦煌遗书共 12000 件，包括完整的卷子和残页，据说其卷数约占现存敦煌文献的四分之一，并绘有石窟平面图和 73 张插图，表格 93 张。鄂著有《敦煌石窟概述》、《千佛洞》、《沙漠中的艺术》等书。

经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整理，编成《敦煌发现的中国文书》，分为四册。已作单行本出版的有佛教经卷《维摩碎金（维摩诘经变文残卷）》和《十吉祥》（1963）、《双恩记变文》（1972）、《妙法莲华经变文》（1984）等，均孟列夫整理。每种均全文影印原文，附孟氏俄译文、注释和序文。每卷的序文分别论及变文的起源、种类、韵文部分的韵律、思想内容、结构和变文讲唱人及其讲唱方式、词汇特点等，实为整理者的研究成果。

孟列夫还编出《中国敦煌写本·佛教俗文学文献》（影印敦煌赞文附宣讲，1963）和《王梵志佚诗集》（1989），后者同我国张锡厚编《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相比，多出 64 首佚诗，均系从敦煌残卷里辑录的，这引起日本学者川口元雄教授的注意而对该书多次发表评论。

俄国所藏的西夏文物属于绝无仅有的珍品。1909 年俄国科兹洛夫考察队来西夏古城遗址哈拉浩特（蒙语，意为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挖掘出大批黑水城文献，计约九千余件，均运存彼得堡。内有从宋、辽、金传到西夏的名贵汉文刻本，有西夏文的儒、佛、道家经典刻本，有文牒、地契、版画、民间唱本、杂学、医书、药方、历书、算命、星相等珍品，并有元代纸币宝钞。这些对于揭开被流沙淹没的西夏国历史上许多未知的事实，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都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从黑水城出土的双头观音也是稀世珍品。

俄国人在整理研究这批文物中，已形成了西夏学。由孟列夫整理、著录汉文文献部分，按佛经、古籍、小说、杂文、官方文件、药方、历书等分类，译释成内容提要，共 375 品目，编成《黑水城汉文文献综录》出版，并写了序文《西夏国汉文文献》。

黑水城文献的主要部分为西夏文本，由克平先从学习西夏文入手，历经近十年（1959—1969）才学成，并编著《西夏文语法》一书，自 80 年代以来已先后整理出唐代小说集《类林》的西夏文译本，并附以俄译文。《文海》的木刻复印本（分成一、二两卷）也译成俄文出版。

中国民间年画也是俄国收藏的罕见珍品。我国宋朝王安石的一首《元日》诗：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把过年贴年画的情景形容得好不热闹！贴年画是民间自古以来的风俗，人们习以为常，对于无论是“新桃”还是“旧符”，总不大注意保存，有个时期甚至当作迷信物品弃置，“文革”中当作“四旧”消灭了。但这种线条简练，色彩鲜艳的民间风俗画反而受外国人喜爱，被作为民族艺术品珍藏，因而许多在国内失传的旧年画反而可以到国外找到。

据调查，俄罗斯就收藏有大量中国旧年画，它在外国的收藏量中占据首位。单是冬宫就有 5000 多幅，其他如莫斯科、喀山、鄂木斯克、伊尔库茨克以及各地城市都有收藏。

俄藏中国民间年画不但数量多,而且题材广,品种全。民俗画如各种神像,包括门神、财神、灶神。风俗画如过年、结婚、喜庆、祝寿、民间游戏等。也有美人画、年历画、山水花鸟画。以小小说、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年画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说唐》、《说岳全传》、《封神演义》、《红楼梦》、《二度梅》、《三侠五义》等。晚清年画则有大量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为题材的,如《台湾军船图》、《炮打日本国》、《法国攻北宁、刘帅获全胜》、《捉拿倭俄奸审问正法》等。

据专家鉴别,其中有许多年画属于中国国内已经失传。1991年由两国学者合作编选的《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以中、俄文本在两国出版)首次把200多幅在中国已失传的年画公诸于世。如清代杨柳青盛兴画店印制的大型《红楼梦》年画:《藕香榭吃螃蟹》,画贾母、史湘云、王熙凤、彩云等二十三裙钗和宝玉在一起。又如早期木刻画精品《四美图》,画有汉代赵飞燕、班姬、王昭君和晋朝绿珠四位古代美人。

俄国几代学者都重视搜集中国民间年画,这是它藏品数量多的一个原因。曾任科学院院长的科马罗夫年轻时在上世纪末就来到我国东北搜集中国年画,并回国首次举办中国年画展。苏联汉学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年轻时在本世纪初来游历华北五省及南方沿海城市,搜集年画为数五千幅左右。他经过长时间研究,著有《中国民间年画——民间画中所反映的旧中国的精神生活》一书。当代汉学家李福清通讯院士并以中国年画专题在欧美、东南亚各地讲学。

译介文化典籍从19世纪下半叶形成规模。应该说,俄国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引进图书。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在华近二百五十年,每届团员中都有人受命购书,还有外交人员或专程来华人员进行搜购。同时也有政府间的赠送或交换。据统计,仅彼得堡的“亚洲博物馆”就藏有中国古籍70多万册。如今莫斯科的“中国学图书馆”所藏也不在少数。两处所藏书籍种类多而且珍贵。仅以《红楼梦》为例,各种刻本、抄本达六十多种,1964年发现其中有一种《石头记》手抄本,是前所未有的版本,为我国已有的12种《红楼梦》抄本之外,增添了第十三种。该书为80回本,系1830年由传教士团一位成员带去的。不久前已用《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为书名影印出版,在国际红学界引起轰动。

这些文化典籍三百年来由汉学家陆续作过翻译和介绍,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作,重点放在诸子百家等文史哲典籍。18世纪初已译出《大学》、《中庸》、《孟子》。随后又译出《道德经》,19世纪中叶,汉学家瓦西里耶夫院士写出论著《东方的宗教:儒、释、道》,综述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至20世纪以来,包括《孙子兵法》、《易经》、《管子》、《论语》等诸子百家均有了全译本或选译,《左传》、《商君书》等也有翻译和研究性的学术专著。至于大学和汉学专科里的课程,凡涉及古代历史、文学和文化思想的教材,都选入这方面的著作(片断、选摘)进行全面的讲授。

第三、第四次热潮:本世纪50和80年代

两次均表现为大规模译介文学作品和进行文化交流。

文学翻译,诗词类从《诗经》到清诗,甚至“五四”以后的新诗都有人翻译。1957年出版的四卷本《中国诗选》(费德林编选)就全面系统地译出古今历代名诗,该译本流传最广。俄译诗选中《诗经》、唐诗和现代新诗为三个重点。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陆游等均出过俄译单行本,有的出单行本不止一种,如杜甫有2种,陶渊明2种,王维2种,白居易多达6种。戏曲类包括译作最多的是本世纪60年代出的《元曲》,共选译关汉卿的《窦娥冤》、《望江亭》、《单刀会》,白朴的《梧桐雨》、《墙头马上》,马致远的《汉宫秋》,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李好古的《张生煮海》,石君宝的《秋胡戏妻》,张国宾的《合汗衫》,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此外,明清名剧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汤显祖的《牡丹亭》、王实甫的《西厢记》都已有了俄译。

小说类的俄译本最多。早在1832年从法文转译了《好逑传》，之后直接从汉文译出了《聊斋志异》，到本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章回小说的名著都翻译出版了。如50年代出版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老残游记》，60年代出版的《孽海花》、《今古奇观》、《说岳全传》，70年代出版的《金瓶梅》、《三侠五义》，80年代出版的《平妖传》、《内蒲团》。其他如笔记小说（《搜神记》、《浮生六记》、《剪灯新话》、《阅微草堂笔记》），平话诗话（《新编五代史平话》），宝卷变文（《普明宝卷》）等等都有不少作品译成俄文。

现代文学翻译的规模更大，尤其在50年代达到高峰，著名作家都出了俄译选集或单行本，如鲁迅（《选集》四卷）、茅盾（三卷集）、老舍（两卷集）、郭沫若（两卷集）、瞿秋白（两卷集）、巴金、曹禺、艾青、张天翼、丁玲、周立波、赵树理等，曾在中国广泛流行的现当代小说如《把一切献给党》、《青春之歌》、《三千里江山》、《人到中年》、《芙蓉镇》、《围城》等都很快就译成了俄文。当代作家诗人如刘心武、蒋子龙、冯骥才、谌容、张抗抗、公刘、苏叔阳、黄永玉等的作品也及时被译介。

俄国介绍中国文学规模大、历史久，尤其在前苏联时代有统一的规划和执行计划，并有组织地进行，因而译作已形成系列，以致从80年代初启动了一个大工程，即出版“中国文学丛书”40种（每一种包括一卷或数卷），囊括了从古代《诗经》到20世纪中期的当代文学名著，多数旧译重新修订，并组织新作的翻译，此项工程计划本世纪内完成（由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等机构负责）。此外，80年代更注意中国反映改革开放的文学与文化产品。

文化交流主要通过政府间的文化协定和民间交流两个渠道进行（在50和80年代政府间的协定都是在原苏联的框架中实施的）。当年的合作与交流范围十分广泛，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互派代表团访问、互派留学生和进修人员、互派艺术团演出、互相举办文化艺术展览、文化电影周、互聘专家讲学，以及互相参加对方的学术会议、文化体育比赛等等。

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俄国具有很高的声望。在历史上，著名作家普希金、托尔斯泰都曾给予热情的称颂。在当代，传统文化甚至影响到90年代的俄国社会。俄国加强了汉学家协会的活动，并且新成立了孔子研究会，在俄国宣传新儒学。俄国的汉学家们凭藉东亚国家，包括日本和“四小龙”等国家及地区经济腾飞的实例，阐释儒学对于国家现代化的促进作用。他们设想借用儒家宣扬的管理思想以解救苏联解体后俄国经济、社会的危机。或者沿用孔子所主张的“为人之道”和“为政之道”以治理社会混乱的顽疾。因而一个时期以来，许多中国文史哲经典（以《论语》等诸子百家为主）重新出版俄译本，经常性或定期的“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不断举行。这使人感到在90年代，俄国汉学界似乎又出现了一股中国传统文化热，由此再一次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